

论我国富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与地域选择

许经勇^①

(厦门大学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我国是世界上人均占有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一现状导致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数量特别庞大,向外转移的任务相当艰巨。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大部分是转移到城市,不仅没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出“重城轻乡”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误区,把转移的重点放在农村二、三产业,放在乡镇企业,放在城乡结合部及县域。

关键词:劳动过剩经济;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我们为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增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济发展成果的很大一部分被快速形成的新增人口和劳动力吃掉,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基本建设仍然不足以应付日益扩大的劳动就业需求。我国劳动过剩经济的格局并没有因为 30 年来的改革开放与发展而改变。因而,如何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始终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必须面对的热点问题。我国不仅城市就业难,农村就业也很难。不过,倘若农村的就业问题解决了,城市的就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里,我们将重点研究劳动过剩经济背景下,我国农民的转移就业问题。

一 我国富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选择

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农业富余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产业选择成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核心问题。从生产要素集约度的角度来看,产业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单位劳动占用资金较少的产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劳动占用资金较多的产业为资金密集型产业;对设备技术水平和就业人员文化知识程度要求较高的产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各国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产业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化的过程。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这是产业结构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调整就业结构的重要途径。如果产业类型选择能够顺应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不仅有利于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有利于就业结构向着高度化方向逐步演进。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来看,大凡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资金)短缺的国家和地区,由传统农业国过渡到现代工业国,都要经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发展的阶段。

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较,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属于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其增值能力是很有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其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生存资料的价值上。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属于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其增值能力是较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其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上。较低的劳动成本只能吸收和再生产较低素质的劳动资源;而较高的劳动成本则可以吸收和再生产较高素质的劳动资源。权衡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效率。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应当是劳动资源的成本和劳动资源的效率的综合体现。而目前我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资源的成本呈上升趋势,劳动资源的效率则呈下降的趋势。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运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进而要求产业结构必须逐步升级。但是,产业结构提升的过程,是企业素质和劳动者素质同步提升的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固有的低素质劳动资源源源不断的供给,是无法替代产业升级对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要求的。不仅如此,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属于资源消耗大的产业,即大量消耗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及矿产资源)的产业,而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旦资源供不应求、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目前已呈现这种态势),这种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消化因资源成本迅猛上升所造成的亏损。以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源成本为支撑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终究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的。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2007 年 7 月 1 日,数千种商品的出口退税被调低或取

^① 收稿日期:2008-03-04

作者简介:许经勇,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农村经济。

消;2007年7月23日,新的加工贸易限制类产品目录出台;2007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又把更多的产品列入到加工贸易限制类或禁止类项目中,并对更多产品的出口退税和关税进行调整。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系列贸易政策的重拳出击,从根本上缓解流动性过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压力,改变中国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结构和中国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性。伴随着中国对加工贸易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人民币较大幅度升值,新劳动法的实施,必然引起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中小企业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并将面临优胜劣汰的严峻挑战。据报道,近期内珠江三角洲将有近万家港资企业停产或转移到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北方的山东省也有部分韩资企业撤离。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与此同时,还应当把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点,逐步转到第三产业上来。根据边际就业弹性原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边际就业弹性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第一、二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加速下降所致。由于第一、二产业内资本挤出劳动力及技术替代劳动力的两大因素的作用,我国第一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已经出现负数,这意味着我国第一产业随着经济的增长,只会挤出更多的劳动力。第二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对就业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小,拉动的就业增长率持续下降,只有第三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基本上维持在0.6以上。从边际就业弹性的角度看,今后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将重点流向第三产业。从我国三种产业的就业比重看,1978~2004年,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下降23.6%,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提高5.2%,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18.4%,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潜力最大的产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据,1985~2004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从事第二产业的增加4948.3万人,从事第三产业的增加7437.4万人。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我们应当顺应我国产业演变的趋势,把发展第三产业和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 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地域选择

伴随着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地域转移也相应频繁起来,并呈多极发散之势。与我国渐进式改革进程相联系,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首先从产业转移开始,进而过渡到空间转移。在空间转移上,首先是就地转移,尔后是异地转移,直到在地域上找到自己的归宿。在富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步阶段,其转移形式是采取“亦工亦农”。亦工亦农人口作为“亦工”的一面,使它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作为“亦农”的一面,又使它同农业联系起来。这部分劳动力农闲时务工,农忙时务农。正处于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的过渡阶段。“亦工亦农”式的劳动力转移,无需增加国家和城市的负担,依靠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力量兴办企事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只是本地乡镇就地就可以发生职业上的变化。富余农业劳动力的这种转移方式,是通过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就是乡镇企业,进

而建设农村区域中心(小城镇)来实现的,它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富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更多的是采取“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即实现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其背景是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标志着我国市场取向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受到很大的冲击;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大大加快。至2006年底,全国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共13212万人,在地级市以上的大中城市务工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64.7%,在县级市务工的劳动力占20.2%。也就是说,农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有八成以上是在城里就业的。

归纳起来说,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地域转移形式主要有两类:即在农村内部消化的就地转移和到城市求职的异地转移。为分析问题方便起见,我们把富余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内部消化视为就地转移,把到城市就业视为异地转移。

(一)二元经济理论与异地转移

二元经济理论是阿瑟·刘易斯最先提出的一个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解释,发展中国家农民贫困的根源主要是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了使农民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中去,将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种转化的动力是工业化,转化的落脚点是农村人口城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元经济转化问题,实质上是农业富余劳动力由农业转向现代工业,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产业转移与地域转移问题,也就是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模式。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当农村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和工业部门吸收殆尽时,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就会上涨,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随之消失,全社会劳动力在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配置就会趋于合理。

回顾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论述的西欧、北美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当由大机器推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在城市建立起来后,原来从事传统农耕的农民,就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车间,便成了城市产业工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城市工业通过为农业提供现代化生产手段,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进而被工业吸收。这个过程不断地、反复地进行,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资本主义工业从农村吸收到城市为止。这与刘易斯所描述的劳动力迁移模型基本上一致。但其前提条件则不一样。那就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供给,并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处于一种无限供给的状态。但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西欧、北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却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因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是不同的。即大多数独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以国家力量集中社会资源,走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选择一条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后发性”的、带有强烈赶超意识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非均衡经济增长

的发展道路,可以带来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较短时间内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但却不能同时较好地解决城市就业与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完全转移。^[1]

(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与就地转移

从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地域选择角度看,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是一种异地转移即城乡转移模型,而托达罗模型则相反,他认为刘易斯模型不仅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富余劳动力问题,还会带来一系列新的城市问题,即“城市病”。为此,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农村的综合发展计划,把农业富余劳动力主要放在农村范围内解决。^[2]即通过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进而建设农村区域中心(小城镇)是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空间。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在农村发展小工业的办法,吸收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其中最有成效的是中国。从乡镇企业发展的历程看,我国的乡镇企业萌芽于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合作化以后的农村集体工副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前身)要有一个大发展”,社队企业逐步融入我国国民经济格局中。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号召,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把联办企业、户办企业都包括进去。从社办工业,到社队企业,到乡镇集体企业,到个体户、家庭私营企业和联户企业,到股份制企业,再到现在的农村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等形式,可以说是我国乡镇企业的演进过程。我国的乡镇企业脱胎于“三农”,又反哺于“三农”,它的根已经深深扎在“三农”之中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承担着促进农民就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艰巨任务,是联接城市与农村的桥梁,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抓手”。至2007年,我国乡镇企业共安排了1.4亿左右的农民就业(占农村从业人员的近1/3),当地就业的就占70%以上,同时为农民增收贡献了近34%的份额。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农村有4.8亿劳动力,其中仍有0.8亿到1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安置,每年还将新增700~800万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乡镇企业来解决。

伴随着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部分农业富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我国农村各类小城镇建设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1982年,全国建制镇只有2678个,1984年后,我国乡镇企业步入快车道,建制镇发展速度随之加快,1984年底建制镇增加到7186个,1990年建制镇增加到12000多个。2005年底,建制镇又增加到19171个,占乡镇个数的52%,它吸收了2亿多农村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28%。

作为联结大中城市和农村桥梁的小城镇,既有城市特征又有乡村特征。小城镇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周围乡村的基础上,它的形成、发展与周围乡村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改革开放30年来,蓬勃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其所覆盖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担当起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在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是大中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既是吸纳和接受大中城市功能辐射的载体,又

是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社会的中心。小城镇的发展过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同步运行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全面繁荣的过程。与小城镇发展相联系的,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它是以县城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带,以广大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小城镇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

三 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地域选择的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富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更多地是从正面思考、正面论述、正面肯定。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经异地转移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没有提高,农村落后面貌并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差别反而呈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从1984年的1.8:1,扩大到1990年的2.2:1,2006年的3.3:1。统计数字表明,2006年,我国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共1.32亿人,但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仅0.26亿人(占19.7%)。就是说,1.32亿农业富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并没有带来其本来应当带动的2~3亿过剩农业人口(农民工的家属)随着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如果我国就业结构的高度化,不能带来人口结构的高度化,就不能有效缓解我国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我国农业和农村也因此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富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也是最凸现的难题,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制度创新工程,包括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中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财税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亿万进城农民工的转移就业问题,就谈不上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从理论上说,农村人口城市化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在当前,却出现农民不愿意被“城市化”的现象。原因在于,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农村人口一旦被“城市化”了,就要交出在农村的承包地,又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保障待遇。在城市通行的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进城农民面对的是转型过程中的不安全,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要使我国的城市化健康发展,就必须确保被“城市化”农民对土地承包权、使用权及其相关的权益。与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相联系,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不能变现。我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只有村民(农业户口)才拥有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办理城市户口也就意味农民身份的改变以及相联系的随之丧失农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且得不到任何补偿。

农民不愿意进城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没有给农民制度化的稳定预期。目前城市的制度安排中,没有为进城农民描绘任何稳定的前景,农民工进城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属于被边缘化的阶层。没有稳定的预期和安全感,这意味着农民工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很快,1995年按居住地统计的城镇化率是29%,2004年达到41.8%,9年内提高了12.8个百分点。但这种意义上

的城市化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流动进城的农村人口,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市民。如果按照户籍的统计口径,199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 23.6%,2004年是 27.5%,9年内仅提高了 3.9个百分点,这就需要我们深刻反思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方式。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是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积累资金,而现在则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获取廉价的农村土地和农村劳动力。这样的体制不彻底改革,不仅农民增收难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农民工也很难转化为市民。

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还没有破除的背景下,我国富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必然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1)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已经不是理论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是“必要”劳动力。具体表现在目前进城的农民工,都是农村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2)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别;(3)导致土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人口城市化速度以及形成数量庞大的亿万农民工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是城乡差别在城市的复制)。由此可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城乡关系的重新调整问题。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由农村转向城市,从此城市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城乡差别也因此呈扩大的趋势。与此相联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际上是农村中素质最好的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面向城市(占 82%),农民工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留在城市,所获得的最低工资除糊口外所剩无几,很难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三农”问题也因此越来越尖锐,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与农业劳动力异地转移并存的,还有另一种转移形式,即就地转移。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相联系的农村工业化,打破了传统的城市搞工业和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即在传统的城市工业化之外,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化,这就是农村工业化,出现了城市工业与农业和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与城市工业不同,农村工业是依靠农民的自发力量兴办的,对农村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与带动性。与城市工业化不同,农村工业化采取了以劳动替代资本的发展方式,将亿万农民带进非农产业领

域,使大多数农民从中受益。与城市工业不同,农村工业同农业有着天然的血脉关系,同农业的关联效应大,甚至是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农村社区以外转移,同在农村社区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对农村经济面貌的改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城乡差别的缩小,所发挥的效应有很大的差别。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坚持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才能确保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广开农民工就业门路,防止农民工盲目涌进大中城市,避免出现的大中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贫富悬殊的现象。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当地转移就业容量;积极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农民在当地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提高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

完全可以预见,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

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到农村二、三产业就业,有利于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传统的产业经济发展战略支配下,我国形成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由于传统的二元经济体制的作用,至今这种经济结构格局还没有根本变化,而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使原来落后的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缩小了农村产业与城市产业、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巨大反差,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逐渐融为一体。农村工业在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的特殊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改革开放 30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才能加快城镇化进程,并有效地解决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 [1] 陈吉元.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127-154.
- [2] M·P·托达罗.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上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316-317.

(责任编辑:徐 蓓)

ABSTRACTS

(1) Choice of Industry and Region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Shift in China XU Jing-yong(004)

Wangyana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lowest per capita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China has a huge surplus of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it is challenging and difficult to shift and absorb it.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mainly shifted to city, yet it led to further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This requires a new thinking of the way to shift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Emphasis should be laid o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the rural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and the county seat—the go-between of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surplus labour economy, agricultural shift

(2) Impermissible Academic Behaviou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Culture WANG En-hua(018)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Impermissible academic behaviour refers to the behaviour against academic systems, scientific norms and scientific spirit. Such behaviour results from the influence of clan culture and relation culture, the imbalance of culture value system, the decline of standard culture's binding force and the sluggish change of value culture.

Key words impermissible academic behavi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ulture perspective

(3) Disclosure of Meaning: Hermeneutic Research Approach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MENG Juan(022)

Teachers Colleg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Humanistic hermeneutic research approach is a concrete practice developed by humanistic psychologists. It has particular connotation, characters, conceptual framework, research procedures and meaning.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humanistic research approaches, hermeneutic research approach makes humanistic psychology into individual experiential practices rather than simply theoretical proposal, enriches and further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uture, it needs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procedure and its philosophic bases, open criticism, make active dialogues with other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see human nature from a practical and dialectic point of view so as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horizon concerning human being.

Key words humanistic psychology, hermeneutic research approach, qualitative research

(4) Tobacco Packing of China: Predicament and Existence XIONG Chu-cai, XIONG Jiu(029)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actice of *Frame Convention of Tobacco Control*, tobacco packing of China is landing itself in a predicament because the range of caution and warning is widened, the caution for health is required to be